

语言与经验：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

南帆

摘要 人工智能参与文学写作已经获得初步成功。人工智能的潜能可以弥补现存的各种不足。但是，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不存在社会历史维度。言说主体、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的有效衔接是社会历史最为基础的活动。语言使用存在两个向度：一是指向外部世界，一是指向语言内部规则。语言内部规则的运用已经足以表情达意。人工智能的遣词造句依据语言内部概率统计，但没有即时报道外部世界的能力。文本研究的“互文性”更适合讨论人工智能文学写作。人工智能写作是一系列文本相互对标，文本背后不存在带有体温的经验。人工智能是文学生产工具而不是参与历史的主体。结构主义与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均处理语言内部关系，二者的理念相反。结构主义往往屏蔽社会历史造成的变化，人工智能的具体概率统计保留了历史信息的进入渠道，但这种统计只能间接证明历史的转型而不是精确描述，无法显现短期之内历史突如其来的起伏。只有作家才能与历史对话，人工智能擅长的仅仅是语词的统计、记录与组合。人工智能写作的产量提高往往与经济收益联在一起，这种产能将被引向大众文学。算法与精准的“投喂”可能形成巨大的信息茧房。这一切将对经典体系背后的文学观念产生重大挑战。必须意识到这个重大改变可能来临。

关键词 人工智能 语言模型 语言内部规则 经验 概率 社会历史

作者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福建福州350001）。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1-0144-11

人工智能的话题正在不同层面产生强烈的震荡。从技术竞争、新质生产力、战争形态、新型就业岗位以及人类是否拥有一个安全的未来，众多观念的交锋四向扩散。相对而言，人工智能与文学写作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附带的次要问题。然而，如果考虑到人工智能可能重组人类、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甚至动摇认识论的基本原则，那么，文学考察的结论可能带来文学之外的启示。

迄今为止，人工智能不仅胜任通常的公文写作，而且迅速闯入文学舞台，出人意外地开始身手不凡的表演。人工智能之所以擅长遣词造句，甚至出口成章，显然得益于“语料库”对于语言模型的集中训练。海量文本或者语音构成的语言材料转换为数据输入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可以借助“语料库”学习语言模式、语法以及上下文理解，包括接受语料所包含的各种知识及其价值观念。这些训练如此有效，以至于人工智能开始尝试复杂多变的文学写作。

回顾短暂的人工智能文学史，许多人必定会提到一个标志性的诗歌事件：2017年5月，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推出署名“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这一部诗集的诗作完全由人工智能完成，机器的文学实践遗留下若干耐人寻味的数据——人工智能研习519位现代汉语诗人的诗作，耗费2760小时完成万首诗作，139首入选诗集。人工智能的诗作水准业已超过流行诗作的及格线，以至于普通读者无法从文学杂志的同类作品之间清晰辨识出来。比较而言，古典诗歌的词汇组合范围相对狭窄，人工智能的操作更为迅捷。祝

寿、酬答或者山水游历的古典诗歌几乎手到擒来。人工智能的散文或者短篇小说写作成绩斐然，短篇科幻小说《机忆之地》的获奖证明了可能企及的高度。相对地说，长篇小说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王峰教授曾经率领一个团队从事长篇小说写作实验。这一部题为《天命使徒》的长篇小说共计 110 万字左右，团队成员负责情节框架设计与后期的润色修饰，人工智能承担大部分具体的写作工作。团队成员共计提出 2000 条提示词作为人工智能写作赖以铺展以及修正的支撑网点，每一条提示词平均收获 500 字左右，作品的完成历时一个半月。这些现象不仅显示了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现状、工作模式，同时展示出可能的潜力。至少可以预计，随着人工智能“算力”的进一步增长，一条提示词可能收获更多的字数。如果说，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作家心血的结晶，那么，人工智能的介入将彻底颠覆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这个变化如此深刻，以至于人们迅速听到两种对立的评价。对于文学说来，人工智能意味着巨大的技术突破，还是指向一条危险的歧途？

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多数作家不欢迎人工智能涉足文学领域。人工智能的高效产能对于作家的文学生产形成重大威胁。一部 110 万字的长篇小说仅仅耗时一个半月，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企及这种写作速度。这是手工作坊与大机器生产的根本区别。人工智能充当文学生产的主力军，作家奇异的才能秉赋再也无法作为不可替代的资本赢得名声与经济收入。这将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当然，人工智能的机器身份并非文学拒之门外的充分理由。进入现代社会，消费者对于机器产品司空见惯。如同人们不会拒绝烤箱烘焙的面包、实验室培育的蘑菇或者缝纫机缝制的服装，读者没有理由对人工智能的文学作品表示特殊的反感。人工智能的参与可能冲击作家的身份与文化位置，但是，社会可以根据新型的文学生产机制调整生产者职责、劳务报酬与其他司法约定。机器逐渐成为愈来愈重要的生产工具，类似的调整必然愈来愈普遍。文学来自机器的生产或者人工制作不再重要，对于人工智能的挑剔毋宁说因为文学本身。文学是“人学”；文学涉及的精神王国无影无形又无所不在，既波澜壮阔又精妙入微，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语言真的能栩栩如生地再现这一切吗？

这种疑问或许低估了计算机语言的描述能力。对于人工智能说来，“人”与周围的世界性质相似。万物皆可计算。医学或者生物学证明，人工智能甚至比人类更为了解他们的身体构造。人类的精神王国亦非技术禁区，人工智能可以精确地重绘这个领域曲折起伏的地形地貌。如果重绘的笔触或者线条过于粗糙，人工智能可以增添扫描的密度，获取更为翔实的影像。的确，人工智能不理解描述的对象，无法与人类的精神王国形成“共鸣”，但是，这不妨碍人工智能的勤勉工作。事实上，作家的文学写作也是如此：不论是人物形象、山川草木还是车水马龙、历史景观，穷形尽相的描绘首先依赖精细的观察、分析与表述，而不是与对象产生“共鸣”。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无法对人工智能报以足够的信任。他们觉得，人工智能的文学作品缺乏神采，缺乏本雅明所推崇的“灵韵”（Aura），一些作家甚至认为，人工智能的文学作品过分“干净”，缺乏自然的褶皱，缺乏人类制作所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些因素恰恰是文学的动人气息。然而，如果神采、“灵韵”、褶皱乃至缺陷不可或缺，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轻松补上这一课。如同“做旧工艺”产生的沧桑之感，伪造褶皱与缺陷并非人工智能的技术难题。所谓的神采与“灵韵”是否不可企及？或许由于缥缈玄奥，二者的内涵尚未获得理论的统一表述。然而，即使超出语言范畴因而难以名状，“可以意会”仍然表明某种信息的存在或者改变。这些信息可能显示在哪一个层面？按照计算机专家的设想，人工智能可以捕获分子层面的信息，这是完整转移人类意识的保证。凯瑟琳·海勒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曾经转述一个理论家如何将人类意识下载到计算机的设计方案：一个人工智能担任的外科医生对于接受手术者的大脑进行颅内吸脂手术，清除颅内物质的同时读取每一个分子层的信息，继而将这些信息传送至一台计算机硬盘。接受手术者清醒之后欣慰地发现，计算机硬盘上的信息与之前的大脑内容分毫不差。^① 这种设想表明，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在分子层面记载或者展示最为微妙的神采与“灵韵”——只要存在这个必要。

可以预计状况是，人工智能的高效产能将会深刻改变文学消费。人工智能的文学作品不仅铺满市场，而

^①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2 页。

且很快主宰读者的阅读趣味。生产者同时生产自己的消费者。即使某些作家顽强坚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精益求精，繁荣的机械化自动生产会迅速将这种景象反衬为古典的传统生产方式。市场的成功往往被同时解读为审美的成功，必须为功成名就的人工智能颁发文学史勋章。不久之后，人工智能的文学作品就会谋求“正典”的待遇：遴选自己的文学经典，提出一批概念命名这些文学作品的特征，召集一批意气相投的文学批评家——当然也可以由人工智能担任——开展分析或者研究；利用评奖或者高额版税持续扩大影响力，最终赋予文学史的正统地位。事实上，这些情节已经全部在现今的网络文学之中预演过了。

无法预计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将倾心于哪一种审美理想——即将投身哪些文类？标榜的美学风格是什么？诗歌或者小说的此消彼长，喜剧或者悲剧的兴衰成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络绎登场，轮流担任文学主角，种种文学潮流的起落与社会历史的运行息息相关。作家首先是一个社会成员。置身于既定的历史氛围，他们的文学作品是主体与外部世界互动的产物。然而，人工智能不存在社会历史维度。计算机不会迈开双腿走出房门，了解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人工智能甚至无法回复如此简单的提问。换言之，人工智能擅长写作的原因是掌握语言，而不是掌握外部世界。然而，文学仅仅是语言内部的事件吗？人工智能的文学作品是否仅仅来自语言的合成？这些结论开始挑战传统的文学认识。由于人工智能的参与，语言、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再度显现出来。

二

可以从一个日常的景象开始：言说者使用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沟通，他的语音和文字获得外部世界的接受；同时，外部世界使用语音与文字给予回复，回复的内容促使言说者再度发言。循环往复的对话构成社会历史最为基础的活动之一。这个日常景象证明了言说主体、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有效衔接。然而，这种状况仅仅是初步的表象。事实上，言说主体、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三个单元内部分别隐含众多的复杂关系。只有进一步分析这些关系，人工智能的位置才能清晰地显示出来。

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显明，言说主体与语言符号之间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争夺。通常的言说表现为，主体使用语言表述思想意愿，或者描述外部世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将具体的语言实践与完整的语言体系区分开来，前者称之为“言语”（parole），即各种语境之中的具体表述，后者称之为“语言”（langue），即语言体系规定的惯例规则，诸如语法、词汇的内涵等等。言说主体的表述千变万化，但是，这些表述无法逾越语言体系的既有规定。按照索绪尔的类比，“言语”犹如一盘又一盘的棋局，“语言”犹如象棋游戏必须遵循的行棋规则。语言体系的既有规定不仅先于个人而存在，并且是个人成为言说主体的前提条件。一个人拥有的词汇量以及种种表述所包含知识与观念决定了主体的“深度”。更大范围内，文化传统之于个人也是如此，只不过文化传统的种种仪式与象征不如语法或者词汇的内涵严格、精确。所谓的主体不是突如其来冒出地平线，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文化的持续训练。未曾接受社会文化训练的个人犹如未曾安装软件的计算机，一堆硬件的拼接无法行使运算功能。语言显然是个人接受训练的展开基础。

即使个人的语言习得始于“言语”，结构主义仍然将“语言”视为主宰个人的“结构”。不论什么时候意识到“结构”的存在，语言始终是个人只能接受而无法撼动的坚固体系。哪一个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推翻栖身的民族语言？这种观念不再将主体视为独立自足的意义之源。很大程度上，文化结构犹如语言结构的扩大，“自我”毋宁是文化结构规训的产物。因此，J. M. 布洛克曼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解释说：“‘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如此。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① 事实上，“我”或者主体仅仅活动在结构许可的有限空间：

这种思想方式向人的独特性和真实性提出挑战，它们是和这样一种传统的想法联在一起的：人，作为一个生物，是自足的。人在他一生中的某些时刻，或许能够偶尔闪发出其自己的光辉；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就必须被看作不过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系统中的一个成分而已。不应当谈人的自由，而应当谈他被卷入和束缚于这

^① 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4页。

个结构的情况。^①

从物理环境、经济基础到历史文化传统，“自我”或者主体身陷多重系统的限制。一个人不可能遁入真空，摆脱种种系统“结构”为所欲为。语言貌似一种软性的系统，但是，这个透明牢笼的坚固程度超过许多人的预计。尽管如此，人类的“言语”活跃多变，以至于对语言体系的规范形成不懈冲击。可以从语言史之中清晰看到“言语”的突围遗留的痕迹，例如，一个语种的词汇数量与日俱增，语法规范持续变异。“言语”所以拥有强大的冲击能量，必须追溯至言说主体的能动性。主体并非被动的“固体”，主体的标志之一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激情。言说主体持续扩大认识外部世界的范围，新事物的命名或者新观念的诞生带来更多的词汇，新的表述形式挣破了既定的语法规范。面对无限的外部世界，言说主体持之以恒地拓展“语言”的边界，竭力开创更大的精神空间。作为一个参照，“言语”的冲击能量与言说主体的能动性是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品质。人工智能的“语料库”训练犹如主体接受社会文化训练的简明图解，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通晓“语言”的所有规定，可以生产种种“言语”，但是，机器内部不存在挣开“语言”束缚的反控制冲动。

语言符号内部关系的分析可以提供另一个考察人工智能工作方式的参照。如同“言语”与“语言”，索绪尔的另一个著名区分是“能指”与“所指”。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语言也是如此：“我们建议……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譬如，“水”或者“树”的笔画结构与读音构成“能指”，两个字的内涵指称某种液体或者某种植物即为“所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结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换言之，一个字的笔画、读音之所以指代某种内涵，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二者的结合毋宁说来自约定俗成的契约。如果一个能指必然指称特定的所指，那么，全世界只能存在一个语种。解释这个结论的时候，索绪尔曾经将语言符号与象征进行比较，后者并非完全任意：“象征……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象征法律的天平就不能随便用什么东西，例如一辆车，来代替。”^② 能指可以与所指寓示的外部世界脱钩，这种状况暗示另一个事实：语言体系的内部规则——亦即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组织原则——业已形成完善的表述机制。诚如克洛德·海然热在《语言人》之中所言：“如果说有一种必要的关系把符号跟某种东西联系起来，那么这种关系不是别的，只能是一个符号跟同一语言内部的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同一体系内的符号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关系，符号的两个侧面的共存关系为此提供了保证。差异的概念运用到语言事实上之所以能够有一个内容，是因为音素的性质和组合构成了一切符号的能指，相互之间不会混淆”。^③

因此，人们的语言使用存在两个向度：一，指向外部世界。“日”“月”“山”“水”“桌”“椅”，这些名词与外部世界的某些实物彼此对应；撤消这些实物，相对的名词同时丧失了意义。更大范围内，许多复杂的语句陈述力图回应外部世界的曲折构造。二，指向语言内部。表述的时候，种种词汇组合按照语言内部制订的规则进行。之所以称为“内部制订”，因为这些规则并非参照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个句子的主语位置或者动词形态并非外部世界的产物。所以，克洛德·海然热告诫人们，不要试图找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全部对应关系，也不要“异想天开地想让有数的词语能够代替无数的事物”，另一方面，语言又“能够表达非实显事物”，譬如这一条街道上明天会发生什么；如果语言与外部世界彼此重合，存在“一种和谐”，那么，人类语言只能是一份单一词汇表和一套通用语法。事实上，“语言不是发现真相的工具。对于个人和社会说来，语言都是表达的工具。因此，语言完全可能是骗人的。它只要求我们遵从一些结构规则，而这些规则绝无理由精确反映世界的发现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以此为代价，语言能够建构任何语句，并非满足再现真相的欲望，而是满足特定场合下特定讲话者的表达的需要。”^④ 无论语言与外部世界保持何种关系，这个事实并未改变：语言内部的规则运用已经足以表情达意。

这个事实解释了人工智能的造句方式。认可一切语法前提下，语言模型根据概率决定词汇的组合与语句

① 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第 12 页。

②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02、104 页。

③ 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组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96 页。

④ 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组建译，第 287、122、144、197 页。

的组合。“喝”与“水”组合的概率最高，“喝茶”可能次之，“喝酒”再次，当然还有“喝可乐”“喝汤”，“喝尿”或者“喝血”十分罕见。语言模型根据上下文依次选择必要的组合。按照出现的概率，语言模型不可能写出“喝树木”“喝哲学”或者“喝星空”这种荒谬的语句。由于强大的算力，人工智能可以参照无数文本的语法与词汇组合，从而在庞大语料库的基础上完成表述。语言模型如此“渊博”，以至于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现象：语言模型不存在即时报道外部世界的能力。语言模型可以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但是，语言模型无法担任直击现场的新闻记者，甚至无法报告此刻的窗外是阳光灿烂还是乌云漫天。换言之，只有获得表述、进入语料库的内容才能进入人工智能的视域。如果语言模型无法即时调阅人工智能掌控的摄像装置并且转换为语言表述，指向外部世界的向度只能付诸阙如。

可以区分语言表述之内的世界与语言表述之外的世界。语言表述之内的世界业已接受符号编码，种种现象纳入符号体系显示的坐标纵横定位。从诸多词汇的关系到叙述语序，语言的编辑乃至重组隐秘地介入外部世界的显现。然而，尽管语言如同笼罩一切的大网，语言之外的世界仍然存在。层出不穷的新物质、新器物以及无法纳入传统表述的内容如同不竭的挑战，以至于新名词、新概念和逾越常规的表述络绎不绝。很大程度上，追逐语言之外世界恰恰成为语言自身拓展的重大诱惑。这时可以察觉，人工智能的工作区域是语言表述之内的世界。目前为止，机器尚未遭受语言之外的世界打扰。

三

外部世界是一个混沌错杂的存在，人们使用一套又一套性质迥异的话语给予描述，例如政治话语、经济话语、科学话语、军事话语，还有日常生活的种种琐碎的世俗言辞。如果说，科学与技术日复一日地重塑物质环境，那么，语言是构筑精神家园的基本材料。错综纷繁的语言背景之下，文学话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描述。文学首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产品，文学的魔力与语言息息相关。文学的主题可能向不同的维度引申，譬如社会历史、人物性格、心理结构、象征与哲理，但是，只有优质的语言才能承担如此复杂的主题内涵。如同一丝不苟的工匠，作家呕心沥血地推敲语言，沉溺于语言炼金术乐而忘返。因此，文学是一个格外活跃的语言区域。外部世界的各种脉动转换新的表述，这些语言事实会迅速进入文学，获得接收、修订与放大：

文学话语时常成为某种新的语言潮汐的前锋。前锋的性质致使文学可能屡屡出现剧烈的语言骚动。通常，人们的日常用语相对平静。一个新的语言潮汐蔚为大观涌过日常用语，这需要明显的时间跨度作为积累。这种时间跨度同时暗示了人文环境转换所需要的过渡阶段。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积累在文学之中常常一夜即告完成。文学可能将这个缓慢的演变凝缩起来。这种凝缩致使新旧话语系统之间的冲突提炼得格外强烈。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语言浪潮可能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文学，在文学内部造成一场席卷一切的运动。很短的时期内，一批迥异于传统的实验作品竞相登场，种种夸张其辞的辩护与反唇相讥的驳诘簇拥于周围。尽管这种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仅仅是语言，但是在许多时候，语言的革命往往成为一种价值体系即将登陆的先兆。^①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文学话语记录了感官与外部世界的种种接触。文学话语的描述表明，外部世界的形象再现依赖感性的表述语言。感性的表述语言不仅是“花”“鸟”这些具象的名词或者“溅泪”“惊心”等抒情词汇，更重要的是相对完整的叙事结构或者抒情结构。这种结构往往构成文学形式的特征。文学形式的感性显现功能是，摒除或者删削种种多余的部分，形象从一套又一套话语的遮蔽之中浮现出来，按照独特的逻辑形成情节或者召唤情感的象征。这时，感官接收的形象开始摆脱失语的黑暗而现身文学舞台。对于感官来说，这些形象往往是熟悉的，甚至司空见惯，然而，日常的反复接触造就感官的麻木与迟钝，以至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时，文学话语力图以“陌生化”的表述恢复感官的认知功能。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那里，“陌生化”这个术语包含唤醒感性的意义。人们可以重温美学史的一个渊源关系：美学概念包含感性学的含义。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马尔库塞认为美学之中隐含着人类解放的维度。感性的美学与封闭、功

^① 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6页。

利或者压抑的现实格格不入；文学话语的审美意义显示出另一种异于现实的空间，这个空间作为“他者”的参照反射出现实的缺失。这个意义上，美学无形地承担着改造外部世界的义务^①；造就“新感性”是马尔库塞肯定文学话语的理由。在他看来，文学的叙事、抒情以及种种特殊修辞与日常用语拉开的距离，犹如美学与日常现实的距离。马尔库塞对于诗歌语言的称赞可扩大至所有的文学话语：“诗句冲击着日常语言的法规，并成为一种媒介，以传达在现存现实中缄而不语的东西。同时，正是诗句的节奏，先于所有特定的内容，使得不现实的现实和真理的涌现成为可能。在这里，‘美的规律’建构着现实，以便使现实清澄可见。”^② 文学依赖的语言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语言、美学、感性经验与社会历史之间存在隐秘的连锁关系。

由于 20 世纪“语言转向”的巨大影响，文学批评的一些著名学派开始聚焦语言问题，譬如“新批评”或者结构主义。涉及文本分析的诸多概念之中，“互文性”是一个后起之秀。考察语言层面的时候，“互文性”拆除了个别文本形成的人为边界，关注文本之间形成的互动。“互文性”来自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对于巴赫金的研究。在她看来，巴赫金在文本内部察觉的“对话性”毋宁是文本之间的对话。克里斯蒂娃指出：“每一个语词（文本）都是语词与语词（文本与文本）的交汇，至少有一个他语词（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从而，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概念”。^③ 按照“互文性”的描述，一个文本的意义不仅来自文本内部，另一些文本隐形地相互穿插，从而形成意义的共享。这些穿插可能是一种援引，一种典故的运用，也可能是另一些先在性文本造就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或者是多个文本的交叉解读。对于后世的诗人来说，唐诗宋词如同长长的影子投射于诗句之中；考察现今的家族小说，往往追溯到《红楼梦》的原型结构。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T. S. 艾略特从《尤利西斯》之中联想到《奥德修》，这些“互文性”显示出令人意外的跨度。“互文性”论证了这种观念：一个文本的主题并非自足，而是由诸多彼此关联的文本相互说明，甚至作为“文本之父”的作家也无足轻重。无论是“新批评”还是结构主义，驱逐“作者”乃至宣称“作者已死”成为一种时髦。“互文性”毋宁说将作家视为语言“结构”的附属品。托多洛夫曾经转述《批评的剖析》作者弗赖的观点：“所有的本文性（textualité）都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而‘独创性’与‘影响’的说法常常是很欠斟酌的：‘独创性诗人与模仿性诗人的真正区别只在于前者更深刻地模仿。’”^④ 这种状况仿佛表明，种种意义仅仅在文本之间流通，自成一体的文本世界没有必要对外开放，如同银行的大量货币仅仅是数字而不再兑换为实物。

相对于孤立的“文本”，“互文性”展示出开阔的视域。然而，这个概念同时暗示出危险的一面：现存的文本已经如此之多，无数的喜怒哀乐或者形而上理念已经获得表述，没有必要继续增添什么，太阳底下无新事，一个文本的意义无非众多文本意义的交互通。无数文本的“互文性”构成巨大的联合体，终极的表述是不是已经大功告成？这意味着意义领域的无形关闭。

至少在目前，这个危险并未到来，意义领域仍然持续开放。新的文本之所以源源不断涌现，因为相继出场的作家分别携带前所未有的经验。正如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之中所言，讲故事的人见多识广，陆续从远方带回种种奇闻轶事，独特的经验是文学不可代替的原始财富。^⑤ 历史并未终结，经验并未枯竭。经验是作家摆脱“互文性”罗网破门而出的资本。与弗赖所形容的情况不同，许多作家热衷于文学形式的独创。《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至现代自由诗，传奇、章回体话本说、现实主义小说或者现代主义小说——新型经验的呼应恰恰是文学形式演变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些文本立即成为“互文性”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所有的文本积累都是起跳的踏板，而不是画地为牢的圈子。

① 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

②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第 172 页。

③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和小说》，祝克懿等译，《当代修辞学》2012 年第 4 期。

④ 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第 104 页。

⑤ 参见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

从文学话语、感性的表述语言到“语言转向”与“互文性”，这些阐述带出的另一个结论是：事实上，“互文性”更为适合考察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人工智能穿梭于无数文本之间，语言模型根据众多文本的统计概率进行字、词、句的组合。语言模型提供的文学文本仅仅与另一些文本相互对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诗句对于新颖的语言组合具有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可能增添另一些参照，譬如“温度参数”。如何从一句通常的陈述转为诗句？DeepSeek 提供的例子是，将“月光洒在窗台”改为“月光啃食窗台”。“洒在”是一个“低温”词汇，安分守己地镶嵌在句子之中；“啃食”是一个“高温”词汇，“月光”与“窗台”由于这个词汇的奇特对接而联为一体。“高温”词汇往往与语义通畅存在矛盾，人工智能必须控制二者之间的最大张力。所谓最大张力并非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统计显示出众多文本——尤其是诗歌文本——对于新颖表述的耐受力。用 DeepSeek 的话说，必须在严谨规则与自由联想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DeepSeek 兼顾的“语义连贯阈值”“文化适配性”与“动态温度调节”均体现为各种权重系数，“算力”综合诸多系数决定词汇的最终挑选。^① 无论如何，这些词汇是各种文本相互作用以及相互权衡的产物，与诗人主体的经验无关。我曾经区分人工智能的“记”与“忆”。人工智能具有超强的“记”，随时可以准确调阅贮存于硬盘的数据；但是，人工智能不可能“忆”。“忆”是此刻经验激活的往昔。回忆亲情、初恋或者一次历险，这些情节与个人精神结构乃至无意识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机器，人工智能不会回忆一个书写软件程序的程序员，也不会回忆一个硬件来自哪一条生产线。相同理由，语言模型内部只有一系列数据指导编码，编织的文本背后不存在带有体温的经验。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人工智能提供的毋宁是“无我之思”。对于人工智能说来，语言到文本为止——哪怕是众多文本的交互形成的“互文性”。因此，即使人工智能提供的文学作品具有完美的表象，经验的阙如表明一个重要的事实：语言、美学、感性经验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连锁关系已经中断。“春江水暖鸭先知”，人工智能不会如同作家那样及时察觉历史的动向。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仅仅是生产文学的工具，而不是参与历史的主体。

四

尽管“语料库”是晚近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语料的自然积累拥有漫长的历史，业已形成庞大的库存。如何打开如此富有的矿藏？语言符号的内部关系成为一个人口。围绕这种关系，结构主义与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分别展示不同的主题。二者的理念与方向迥然相反，而文学成为殊途同归的交汇点。

无论是将结构主义视为一种理论体系还是将结构主义视为一种“活动”或者“方法”，语言学显然是结构主义的重镇，索绪尔是当之无愧的创始人。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表明，他力图从众多共时的语言现象背后清理出一个普遍的语言结构。如同一个隐形的骨骼，众多语言现象无不进入结构指定的方位运行。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人类知识愈来愈明显地流露出孤立与片断的倾向，与此同时，另一种返回“有机体系”的渴望开始滋生，结构主义如同这种渴望的理论产物。罗伯特·休斯指出结构主义对于“系统”的依赖：“在这个系统之中，所有的成分都相互连接，因此可以从任何有意义的样本中被交互地推导出来。”系统的概念重要到这种程度，结构主义甚至在“在系统的充分性并不存在的地方假定它的存在”。^② 结构主义对于语言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索绪尔的一些观点——例如言语与语言、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横组合与纵组合以及二项对立——获得了普遍的认可。语言学的成功启示了文学研究。从叙事学到诗歌语言分析，结构的观念开始提供一套新的理论模式。罗伯特·休斯如此描述：

① 2025年3月份，我曾经与DeepSeek讨论人工智能诗歌写作机制，DeepSeek完全按照数学概率的各种对比考虑语词的选择，与外部世界的感受无关。对于“语义连贯阈值”“文化适配性”与“动态温度调节”，DeepSeek的具体解释原文如下：“1. 语义连贯性阈值：实验表明，当温度超过1.8时，中文诗歌的可理解性（BARTScore）会从基准值0.72骤降至0.51，但新颖性评分（人工评估）从5.3升至8.1（满分10）。这揭示了温度参数在合理性与创新性之间的权衡。2. 文化适配性：在生成中国古典诗词时，温度通常需控制在0.5—0.8之间以遵守平仄规则，而现代自由诗可放宽至1.2—1.5以释放意象张力。3. 动态温度调节：先进模型如GPT-4已实现分段温度控制：诗行开头用高温（T=1.6）触发新颖意象；中间段落降至T=1.0维持逻辑；结尾回调至T=0.7确保收束合理。”

② 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刘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312、2、17、15页。

结构主义则可以在文学研究中要求得到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因为它试图建立一个关于文学自身系统的模式，以此作为考察单部作品的外部参照。通过从语言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通过力图界说那些不仅仅在单部作品中而且在整个文学领域内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结构原则，结构主义已经努力——并正在努力——为文学研究建立一个尽可能科学的基础。……结构主义的核心就是系统概念，一个通过改变自己的特点但同时保持其系统结构来适应新条件的完整的、自我调节的实体。所有的文学单位，从单个句子到整个语序，都可看作与系统概念有关。具体说来，我们可把单部作品、文学种类乃至整个文学都看成相互关联的系统，并且可以把文学看成人类文化这个更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①

然而，文学结构主义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成功。许多时候，代表总体的“结构”概念对于单部作品的分析收效甚微。对于“结构”说来，一流作品或者三流作品、古典作品或者现代作品以及诸多作家的个性风格几乎没有区别。作为一种理论模式，结构主义遭受两个方面的挑战。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来自语言内部。认可结构主义关于能指与所指等论断之际，解构主义同时察觉某些理论裂缝，这些裂缝足以瓦解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设想。另一种挑战来自社会历史学派。正如伊格尔顿所言，“结构主义对历史变化问题感到困惑”；在结构主义看来，“即便个人赖以存在的符号系统能够被视为在文化上是可变的，支配这些系统进行活动的深层规律却是不变的。对于‘最严格’的结构主义来说，这些结构是普遍的，它存在于一个超越任何特定文化的集体心灵之中”。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往往排除社会历史对于研究对象的干扰，那么，人文学科通常将社会历史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参数。相对地说，语言系统显现出更为稳定的性质，结构主义“这个语言学模式隐含着一种明确的人类社会观：在一个本质上并无冲突的系统内，变化只是干扰与失衡；系统会动摇片刻，然后重新恢复平衡，并将变化轻易地消化”。^②然而，相对于语言学，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互动远为明显。这种互动不仅显现于主题与内容，而且显现于文学形式系统。从诗、词、曲到叙事文学的兴盛，从白话文运动、五四新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朦胧诗”、新现实主义或者先锋小说，从电影、电视连续剧到活跃在互联网的网络小说或者小视频，社会历史的冲击始终是文学形式演变的深层原因，并且决定未来的演变方向。这个意义上，文学形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静态的有限“结构”不可能吞噬无尽的历史。的确，如同罗伯特·休斯所言，一些结构主义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人类为自己编造的一个满意的神话。在历史学家看来是不断进步的东西，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仅仅是转换或移置”。^③如果将所有的文学形式——包括赖以运行的符号与传媒体系——全部视为“结构”这个剧本事先安排的节目，无异于将“结构”制造的“宿命”作为所有历史的终极解释。

相对于结构主义的宏大意图，人工智能仅仅关注语言内部一个细小的接合部——词汇与词汇如何衔接。人工智能完整地统计语料库内部各种词汇相互组合的概率，概率的高低成为语言模型构造句子的主要参照。对于人类的语言习得说来，如此巨大的工程几乎不可思议，个人只能对庞大的语料库望洋兴叹。研究表明，儿童的语言习得并非笨拙的字、词、句模仿，很大程度上依赖“结构”的总体性转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这种先天机制即“普遍语法”。儿童不可能统计接触的少量语料，这些语料的意义是作为触媒启动先天机制潜藏的语言能力。事实上，儿童所能掌握与创造的语句远远超出模仿与积累赋予的内容。如何从有限的个别经验背后发现普遍的理念，“结构”隐含的形而上性质显然是人类富于哲学意味的追求。相对地说，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不再依赖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构”，而是埋头从事朴素的概率统计。由于强大的算力支持，人工智能的统计范围遍及语料库的无数文本与词汇，形成极为庞大的参考数据。“积跬步以致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河”，人工智能的文学作品即是从不计其数的词汇组合选择中积累起来。

结构主义与人工智能的考察范围无法逾越语料库的边界。皮亚杰不仅肯定结构的整体性，同时指出结构的转换性与自我调节性，尽管如此，结构主义想象的系统结构仍然显出闭合性质。结构主义有意无意遮蔽历

^{①③} 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刘豫译，第14—15、308页。

^②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2、121、122页。

史表象变动不居的一面，力图绘制出一个稳定的结构轮廓。相反，人工智能专注于众多个别词汇的概率，对于具体与精确的重视无形回避了形而上学的僵硬与固执。即使人工智能仅仅在语言内部从事词汇组合，但是，概率的统计仍然保留了历史信息进入的渠道——各种词汇使用概率的变化某种程度上透露出历史已经或者正在发生什么。“马车”或者“轿子”的使用次数逐渐减少，“汽车”或者“火车”的使用不断增加，概率的变化显然是历史状况的折射。人们还可以从近期的日常用语之中察觉，与战争相互联系的词汇逐渐削减，包括以战争作为各种工作隐喻的词汇，譬如“战线”“歼灭”“尖兵”“哨兵”“拳头产品”，如此等等；另一些领域的专门词汇愈来愈密集地出现，譬如经济学词汇、法学词汇、科学词汇、医学与保健词汇、互联网词汇，如此等等。各种词汇使用概率的增减与社会气氛以及历史动向遥相呼应。

但是，人工智能的概率统计只能间接证明历史转型的某种迹象而不是及时的精确描述。重大的历史转型沉淀为各种词汇的重新分布，这个过程需要相当的时间。当语言模型将高概率的词汇组合作为首选原则的时候，厚古薄今成为一个必然的倾向。两个词汇组合的概率愈高，古往今来的认可程度愈强，积存在词汇组合内部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愈稳固。无数词汇按照高概率的原则组合，人工智能的文学作品不知不觉地遵从既定的种种规范，不至于如同一些特立独行的作家，突然抛出一部惊世骇俗之作。文学史曾经出现一些剧烈震荡的时期，例如浪漫主义对于古典主义的突破，现代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反叛，或者，五四新文学以激进的姿态与中国古典文学分道扬镳。这些震荡的明显表征是，一批新的词汇、新的表述方式一拥而入，传统的文学形式被视为“保守”的标志而倍受冷落。作家通常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化感官。新的历史潮流来临之际，作家时常将捕获的气息转换成另类的表述，甚至以不无夸张的方式投入文学，形成声势浩大的语言革命。人工智能不可能制造这种性质的事变，机器不会察觉历史潮流产生的压力。

“关键词”考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一些研究涉及关键词的概率统计，例如某一个关键词在指定历史时期重要刊物的露面次数。“阶级”“革命”“大众”“科学”这些词汇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 20 世纪之初获得的频繁使用表明，一种新的思潮正式抵达。许多时候，人工智能的概率统计并未显示清晰的时间之轴。语言模型训练的时候，词汇背后文本的时代特征时常遭受模糊。围绕这个问题，我曾经与 DeepSeek 交换意见。DeepSeek 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将“臣启陛下”这些句式置于古代文献范畴，对于“小姐”一词的古今之别无法区分。训练数据包含古代文献、现代书籍与互联网网页的时候，不同来源的词汇组合概率可能被“平均”化。这时，“之乎者也”与“互联网”可能被赋予相似的合理性，具体的选择视上下文决定。作为一种平均数，语言模型依据的词汇组合概率无法显现短期之内突如其来的巨大起伏。换言之，只有作家可以及时与历史对话；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仅仅是无动于衷的统计、记录与词汇组合。

五

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仿佛是一个意外收获。这是计算机与互联网赐予文学的福利。

文学业已存在一个权威的经典体系。从《诗经》、荷马史诗到众多声名卓著的现代文学大师，文学史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这个经典体系不仅是一批文学作品的肯定，同时提供了各个方面的文学标准。对于学院的文学教育说来，这个经典体系成为无可置疑的教材；文化传统的构成之中，这个经典体系成为文学的标高，文学批评从中提炼衡量的准则；后继的作家不仅将经典体系视为范本，而且将写出经典作品的作家奉为楷模，他们的刻苦、勤勉、专注以及耀眼的天才无一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经典体系的大部分作品寄存于纸质文化的种种传媒，意识感知、书写的速度、文字的推敲与斟酌以及编辑、印刷、发行无不内在地成为文学的组成部分。至少在目前，作家使用纸质文化的各种工具从事文学生产，生产速度与社会需求基本协调，没有出现供不应求带来的文学饥荒。因此，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并非这个经典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来自另一个源头，具有不同的意图与功能。

高效的产能是人工智能首屈一指的优势。相对于自动化的机器写作，作家的字斟句酌笨拙而原始。曹雪芹的《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福楼拜费尽心机写出五行，半天之后又删去三行，如此难产怎么可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产量的追求始终与经济收益联系在一起，生产速度即是金钱。这是人工智能进军文

学的首要理由。否则，机器的加盟多此一举。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显示出新兴产业的潜能，蜂拥而至的网络小说提前证明了这一点。

文学写作简化为语言内部词汇的合理组合，这种数量巨大、性质单纯的工作是人工智能的拿手好戏。机器的识别与自动化处理速度是人类所无法比拟的。语言内部的词汇组合可以甩开外部世界，甩开曲折起伏的历史波澜，文学写作获得了空前的速度——犹如不存在自重的车辆行驶在没有摩擦力的轨道上。仅仅考虑词汇的组合可能形成何种意义，仅仅在“互文性”的意义上制造各种语言片断的交相辉映，这种写作曾经在“渊博”的意义上令人惊叹。黄庭坚曾经用“点铁成金”形容这种写作：“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① 汉娜·阿伦特反复说过，本雅明渴望写一部完全由引语组成的著作：“本雅明的理想是写一部通篇是引语、精心组合无须附带文本的著作。”“主要工作是将残篇断语从原有的上下文中撕裂开来，以崭新的方式重新安置，从而引语可以相互阐释，在自由无碍的状况中证明它们存在的理由。”^② 黄庭坚或者阿伦特的述说之中，“互文性”写作仅仅是一种“理想”，只有气质独异的个别作家可能承担；然而，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实践突然将这个问题放大千百倍：社会历史维度阻断之后，单纯的“互文性”写作打算提供何种类型的故事？

至少在目前，这仍然是一个虚拟的问题。尽管如此，人工智能的巨大产能无形设立了一个前提：机器的意义是增加畅销作品的量产规模从而扩大文学消费。虽然文学经典体系的发行与传播不得不依托消费形式，但是，杜甫、曹雪芹或者福楼拜、卡夫卡的首要意义并非销量与利润。人工智能并非以惊人的速度复制一批苏东坡或者托尔斯泰。经典作家的精神探索如此深邃，以至于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领悟乃至再三回味与反复启迪；因此，经典体系从未出现产量的短缺问题。按照日常用品的轮换节奏预计文学作品的订单，人工智能的机器产能通常被引向通俗的大众文学范畴。如果说，人工智能的古典诗歌写作如同某种场合的文学应酬，那么，科幻或者玄幻显然更适合纳入投入、产出与利润的经济循环链条。大众文学并非一个同质的固体，而是包含众多类型。相对于文学经典体系的各种探索性主题，大众文学更为注重曲折离奇的情节以及欲望、快感与象征性精神抚慰。许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对于经典体系亦步亦趋——没有必要始终将改造世界的重任压在文学肩上。快感或者娱乐难道不是文学的职责吗？卸下繁重主业的时候，多数人仅仅想放松一下。这时，经典体系的严肃与沉重令人生畏，大众文学毋宁是更为适合的对象。如何进一步提高大众文学的产量？人工智能应声而出。

对于人工智能说来，大众文学的重复主题、类型化故事与有章可循的规律更适合数据的统计与处理。只要快乐货真价实，没有理由因为闭门造车而非议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更大规模的大众文学量产必然对语言模型训练产生影响，语言模型的概率统计又将再度巩固大众文学的写作模式。摆脱外部世界与社会历史制约，这种循环可能在人工智能内部愈来愈迅速，巨大的信息茧房必将迅速形成。由于成本低廉以及产量巨大，由于互联网与算法共同形成精准的“投喂”销售技术，这种信息茧房可能扩张至整个文学领域，甚至成为无可匹敌的主宰。当人工智能分别进入工程设计、农业生产、医疗门诊、程序编写、课程教学乃至会计、驾驶、家务的时候，人工智能的文学生产已经不再令人惊异。回避粗鄙的外部世界遁入一个乌托邦空间，这种冲动由来已久，古老的柏拉图洞穴寓言与数字化时代的“元宇宙”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或许在语言符号领域再造一个相似的空间。如果人工智能构造的信息茧房开始控制语言、美学、感性经验乃至社会历史的认知，另一种无形的屏障是否即将降临？

提前预测人工智能制造的文学形势，这种论述带有科幻作品的意味。的确，我愿意提到一部寓言式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黑客帝国》的情节与主题曾经引起一些哲学家的关注：幻象的囚禁与突围。^③ 电影之

^①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见《黄庭坚全集》第2册，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5页。

^② 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班译，第23、28、65页。

^③ 参见威廉·欧文编：《黑客帝国与哲学》，张向玲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中“缸中之脑”的可怕镜头是，一批人漂浮在营养液之中，脑后连接的一个插头输入种种虚拟的幻象，这些幻象联成一个庞大的意识网络整体。虚拟的幻象来自母体 Matrix，一套由人工智能控制的模拟程序。幻象中的人们安逸幸福，美味可口，美人如花；幻象之外是战争洗劫之后的废墟与荒漠。《黑客帝国》抛出的问题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居留在安逸幸福的幻象世界，还是冒着死亡的危险返回残酷的真实？——押上生命作为赌注，赢得的荒凉真实又有什么意义？谁又能保证，那个荒凉的真实不是另一台母体 Matrix 虚拟的幻象呢？然而，电影的主人公尼欧毅然吞下红色药丸，他选择揭露真相。不存在多少实际的理由，毋宁说尼欧意识到某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没有人知道真相的终点在哪里，重要的是，尼欧愿意始终保持承担使命的人生姿态。《黑客帝国》的科幻情节背后，种种隐喻意味深长。

对于技术逻辑或者经济逻辑说来，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必然。对于文学说来，人工智能的介入将会带来什么？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学生产体系，文学的传播与消费将会发生剧烈震荡，这一切可能带来文学功能的再认识。之所以重提文学的经典体系，因为经典体系所认可的真实、主体、历史等等观念都将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战。当然，没有必要预先赋予挑战的褒义或者贬义性质，重要的是及时意识到，一个重大的改变可能甚至已经来临。

（责任编辑：张 眇）

Language and Experience: Literary Writing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N Fan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in literary writing, demonstrating potential to compensate for existing shortcomings. However, AI-generated literature lacks a social-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peaking subject, linguistic signs, and the external world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al activity of social-historical existence. Language use has two dimensions: one directed toward the external world and the other toward internal linguistic rule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l linguistic rules is sufficient for expressing meaning. Although AI constructs sentences based on probabilistic statistics, it lacks the capacity for real-time reporting of external events. The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in textual studies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discussing AI’s literary writing. AI writing is a series of texts referencing each other, with no experiential “warmth” behind the texts. AI functions as a literary production tool rather than a historical agent. Both structuralism and AI language models address internal language relations, yet their philosophies are opposite. Structuralism tends to obscure changes caused by social history, while AI’s probabilistic statistics retain a channel fo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though these statistics can only indirectly demonstrat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rather than accurately describe them. They cannot reveal the sudden fluctuations of history in the short term. Only human writers can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history; AI excels only in word statistics, recording, and composition. The increase in AI-generated output is often linked to economic profits, pushing this output toward mass literature. Algorithms and precisely targeted data inputs risk fostering vast information cocoons, challenging the literary concepts underl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ry system. It is crucial to recognize this impending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nguage models, internal linguistic rules, experience, probability, social history